

移民岁月 第十二期

移民垦荒新乐章(二)

刘天明

1958年至1965年

三是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移民流失回乡。大量的浙江移民的到来给条件准备不足农垦系统带来巨大压力。由于条件有限,住房吃饭成了大问题。在住房上,原来一家住一间的,现在中间隔一条布单子住两家。新建的生产队搭半地下的地窝子,有的牛棚、马圈也改建为住房,有的农场场部让单身干部晚上睡在办公桌上,农垦局下场工作人员晚上睡在长凳上。暖泉农场六队1960年秋窑洞倒塌,浙江青年有一家三口被砸死。口粮不够吃就不顾条件地扩种,前进农场拖拉机不够,用汽车带上播种机播种,直到7月中旬还在播种水稻。1960年全农垦粮食播种面积达到23.74万亩,比1959年增加1.7倍,但亩产只有45公斤,比1959年降低60%。年末全农垦总人口由1959年的10764人增至38149人,粮食供应不足,10月份职工口粮降到每人每月9公斤,开始“低标准、瓜菜代”,制作稻草淀粉、“人造肉”等食品充饥。这时,自治区又开展“反坏人坏事”

“反地方民族主义”的“双反”运动,仅前进农场就批斗273人,送平罗县监狱劳改劳教集训的177人,分别占该场职工总数的5%和3.3%。冬季住房紧缺,烤火煤供应不足,口粮供应量少,许多人浮肿。1960年10月23日,前进农场组织清淤“八一”渠时遇寒流,11名身体虚弱的职工在大风中走不动而冻死。大批浙江支宁青年变卖家被逃离农场,返回原籍。由于口粮标准太低,死了一些人。据1961年7月统计,农垦系统有孤儿89人,其中父母双亡的遗孤58人,父母逃回原籍的弃孤31人。

四是调整、充实,得到良性发展。1962年起各农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逐步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实行了一系列的符合实际的措施,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年底,全农垦12个国营农场的耕地发展到23.36万亩,职工17729人,粮食总产量由1958年的1050万公斤增至1946万公斤,增长79.6%。亩产由103.3公斤增至120公斤,提高16.7%,工农业总产值由368万元提高到916.8万元,增长

1.49倍。生产条件的改善使移民人心稳定。

1965年至1974年

1965年11月,平吉堡一、二农场,暖泉一、二农场,前进一、二、三农场,陈家圈牧场划归农垦十三师领导。1970年3月,农垦十三师奉命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农业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简称农五师)。自治区农垦局下属的国营农场有灵武、连湖、巴浪湖、渠口等4个农场。农五师是学习新疆建设兵团移民开发活动而在宁夏进行的移民开发活动,属农垦开发活动。自治区农垦局及各单位各市县所领导的农业开发活动属农垦的范畴。

此阶段屯垦开发活动发生了一些新的集体性的移民情况。有资料可查的较大规模的集体性移民活动有:1965年6月至10月,平吉堡、暖泉、前进等3个农场安置北京、天津知青青年4486人;1965年8月至9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从师团到班排的各级管理干部和农业、机务技术人员多人,支援宁夏组建农业生产建

设师;1966年12月至1967年春天,青铜峡水库淹没区的渠口农场的2个生产队迁移到连湖农场,共98户,459人,另外2个生产队迁移到灵武农场,共163户,745人;1970年2月,青铜峡水库搬迁区的渠口农场职工迁往简泉农场459户,2315人,其中劳动力1094人。

除了上述几次较大规模的集体性移民外,零散的移民情况也时有发生。一是农垦职工家属、亲戚投靠亲人加入到农垦人的行列。二是也陆续招了一些外省和本自治区的农民进入到农垦队伍中。三是也安排了部分部队复转军人,使农垦系统的职工人数有进一步的增加。以农五师为例,据《宁夏农垦志》记载:“安排农村户口的亲属到农场的人数多,总人口在4年间由26090人增至31452人,人均耕地面积由6.16亩降为5.46亩。”其政治、经济发展受文革的影响,但在动荡中有所发展。

1974年以后,农垦经济得到了稳定发展,从移民角度来看,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集体性移民现象,但零散的人口迁移情况始终存在。

宁夏富硒枸杞第一人(三)

——访浙江支宁青年南梁农场场长徐阿奎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徐阿奎:1974年兵团撤销了,又从农垦转向农垦,农垦时有个好处,就是穿的衣服是发的,改农垦后这些就不管啦,但在发展农业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现在看,我离开浙江时在誓师大会上承诺的三条都做到了。通过我们的艰苦奋斗,把大荒滩都变成了高产良田,第一条我做到了;不当逃兵也做到了,刚到宁夏时条件很差,很多人受不了,也适应不了这里的生活,都纷纷返回了家乡,我们老家的领导知道这个事情后还给我来信说,如果要想回来就回来,还会适当的给我安排工作,我给他回信说:“我是党员,党员说话必须算数,当初报名时到宁夏就是准备吃苦的,不是享受的,要是享受的话,宁夏人自己就会享受的,用不着我们千里迢迢的去赶这个场子。”

我承诺的第三条就是在报纸上见,这一条我也做到了,到这里两三年时间后,报纸上就报道了我们支援宁夏建设的消息,老家的人也从报纸上得到了消息。《浙江日报》登了,《宁夏日报》也登了,江浙人民广播电台也来采访了。

我们这些支宁人来的时候决心都很大,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真正遇到了困难,大部分人又都离开了,那时候叫逃兵,但现在对回去的人也理解了。当逃兵的原因很多,先是低标准吃不饱;再一个到宁夏后就遇到

了“双反”运动,有很多扩大化的问题,浙江人受冲击最大,也很委屈。

还有一个原因是来之前把宁夏宣传的很好,什么鱼米之乡啦、塞上江南呀、瓜果飘香啦、遍地牛羊呀,但到这里后不是这么回事。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的没办法,到地里拔个萝卜、挖个土豆、偷个玉米的,被发现后要批斗关押的。还有的牢骚多,当时左倾的很,上纲上线,当成闹事和坏人坏事来处理,很多浙江青年成了打击的重点,有的被劳改,有的被判刑,很多是处理的过重了。

文革后我们也向上边反映过这些问题,当时我们到了北京,找到了农垦部部长王震,还到山西找过当时的宁夏领导刘格平,最后“双反”运动中受冤枉的同志都给平反了。在“双反”中最让人奇怪的是还分配了抓坏人的指标,一个单位要抓出多少人出来,完不成指标不行,于是就形成了群众斗群众,你揭发我、我揭发你,谁都不信任谁。极左路线也造成了大批浙江人逃离宁夏。

南梁农场原来基本上是种水稻为主,当场长后最头痛的是作物结构的调整。我们原来有两个老大学生,由于成分不好,不太爱说话,但他们了解的农业信息特别多,1993年他建议我们搞富硒枸杞。他说,南梁的土壤里硒的含量很高,而富硒枸杞以前没人搞过,我是南方人,知道宁夏的枸杞在南方是很吃得开

的,市场问题不大,于是我们就开始试种了几百亩,后来成功了。

因为这两个老大学生的父母亲都是山西大学的教授,他的弟弟在美国,是专门搞食品研究的,他母亲还专门给我们讲了富硒枸杞的种植技术要求,又给我们提供技术指导,他弟弟还专门给我们做质量检测顾问,产品出来后送到美国检测,检测结果超出我们的预期。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南梁的富硒枸杞还出名了,连续三届获中国优质农产品金奖。

获得这个奖后把南梁的富硒枸杞品牌打响了,第二年又第二次获得全国优质农产品金奖。当时的自治区主席白立忱特别高兴。鼓励我们要搞好品牌保护,我给白主席说:下次的金奖还是我们的;白主席说:你要是第三次拿到金奖,我亲自去给你们祝贺。第三年我们又拿到了这个金奖,白主席也真的兑现了承诺,亲自到南梁农场祝贺我们,还带着报社、电视台记者帮助我们宣传。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富硒枸杞已经搞出来三年了,宁夏科委才准备研发这个项目,还让我去参加一个研发座谈会,我说我们已经搞出来了,他们还说老徐你不要开玩笑。他还告诉我,这次请的是西安大学的农业专家,我告诉他,我们请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专家,他们开始不相信,后来看到了产品获奖证书才相信,原来准备召开的那个会也没开成,我们

的枸杞比普通的价格翻了一番。

随后我们的富硒枸杞又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办的国际农产品博览会,农业部一位副部长带队去的,在那个会上,当年中国带去那个博览会的产品有好几百个,获得了五个金奖,宁夏的富硒枸杞又获奖。

在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定三个人发言,我是其中之一。我说宁夏种富硒枸杞品质好的关键第一是气候条件,这是天时;第二是宁夏种枸杞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是地利,第三我们有大批种植枸杞的科研人员,这是人和,我们又全部施用的都是有机的,羊粪、牛粪、油饼等,占据了是天时、地利、人和与绿色的农业生产要素。会上订单就来了,当年自治区政府还把把我们南梁的枸杞定为出口指定枸杞。

1994年后又从场长的位置上转到书记,到退休也没有离开农垦。当选过自治区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支宁61年,没有一点后悔。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党的教育和父亲的教育都很重要,踏踏实实做事,不做发财的梦,南场有3万多亩地,1600多职工。当场长书记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要说最大的成绩应该是带着大家一起,搞出了富硒枸杞这个品牌,这不是我的,是宁夏的。

(商银生 马君武 整理)

解放前后的中宁县城市场

杨应林

流动摊贩,往返叫卖,加上柴余双方的讨价还价声很是热闹。

菜市。在现灯光球场处,紧靠南城墙根,约2亩田大,有3个出入口。市内有固定菜贩20余家,终日营业,更多的是来自城郊的菜农。菜的品种依季节变换而不同,春夏之交主要是韭菜、白萝卜、菠菜,还有苦苦菜等野菜。夏秋季蔬菜品种最多,有茄子、辣子、刀豆、黄瓜、菜瓜、茼蒿、葫芦、山芋、莲花菜、蘑菇及沙葱等。但没有西红柿、菜花、大白菜、油菜等,因为那时还没有引进这些品种。冬春时蔬菜品种最少,主要有山芋、胡萝卜、莲花菜、豆芽菜。豆腐常年都有。

炭市。初在西头道巷理门公所西侧空地(现为广播局西端),后迁西二道巷。最后一个牙行名叫冯运林(笔者同学),他还有几名伙伙。他们经商会允准控制着炭市,其计量工具是大杆秤和升、斗。大杆秤用来挂块炭,升、斗用来称末炭。收取佣金的方法是每过秤一块炭,牙行便留下卖主的一块三五斤重的炭;未炭视数额大小收取多少不等的底子罢了。块炭价比末炭价高出几乎一倍。当时炭来自于北山(碱沟山)、土坡(现属同心)、上河沿(属中卫管辖)和灵武四处。北山和土坡产的无烟炭,论质量,前者优,后者劣。上河沿产的是烟炭,灵武的是磁窑堡和石沟驿的咋子炭。因产地距县城都较远,所以

运输方法也不同。北山炭是中宁用炭的主要来源,距县城约35公里,还有黄河相隔,运输很不方便。春、夏、秋三季先用木轮大车和畜力把炭运至北河岸边,装船渡河,再运至县城。冬季黄河封冻,可直接运输,这时也是河南农民买炭存炭的大好时机。土坡与北山距离相等,不过河,只因炭质松软,燃烧时间短和烟气呛人,虽然价格低,但买的人少。烟炭多用于铁匠炉、砖窑及有钱人冬季烧炕,一般是用木船和排子从黄河运来,价格也不低。最贵的是咋子炭,从磁窑堡和石沟驿用骆驼驮来,有钱人家冬季用来取暖。

草市。名曰草市,实际还有柴,地处东南门外拐角处。这里车马道较多,脚户买草喂牲口十分方便。草有谷草、稻草、青草等,柴有麦柴、胡麻柴、毛刺柴、蒿柴、干柴等。草多由附近农民经营,乡农民运来的多是毛刺柴、蒿柴和干草。

入市。旧中国私有经济是主体经济,雇工剥削合理合法,农村中的地主、富农除雇工外,农忙时还要雇些短工,因之入市应需而生。入市一贵在南北桥(现为南街柳青渠暗桥处),冬春两季无人上市,夏秋季才有。黎明时分,打工的贫雇农就三三两两带着锹、杈棍等小农具匆匆赶来入市。雇主也来得早。双方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达成口

头协议后,打工者便随雇主而去。找工者除拿工钱外,割麦子必须吃大卷子和花豆米汤,回家还要拿一个大卷子。干活中不许雇主打骂。如果连续几天活,雇主还要免费提供住宿。那时干活没有现在的包工和8小时工作制,必须干到天黑才收工吃饭、领钱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中宁县的市场变化大而且有反复。从1950年开始,因土改而无人敢雇工了。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不准个人经营粮食,米粮市不复存在。1958年成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后,生产资料悉归集体所有,骡马市、菜市、炭市和草市均被淘汰。

1959-1961年的3年困难时期,党和政府重新调整了国民经济,1962年给农民分配了少量自留地,又恢复了米粮、菜和骡马诸市,市场又趋活跃,只是上市物资比较匮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政策,自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宁县的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草市外,其余诸市不但全面恢复,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收入及购买力的提高,又陆续增加了肉禽蛋、调料、小吃、水果、服装鞋帽、小商品、专业修理等近20种专业市场,应有尽有,非昔日的市场可相比。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在银川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

贾祝九

解放前,我负责组建中国国民党宁夏省银川市党部。关于国民党在银川的组织活动史料还得从省级说起,因为有些组织活动,是与省党部有关系的。1941年下半年至1947年初这一段时间是我亲自经历的,我简述如下。

宁夏省党部的组织

1941年至1944年。省党部内设4个处,秘书处、组训处、宣传处、监察处。各处处长由委员兼任。秘书处处长由书记长周百程、军法处长程福刚委员兼,组训处处长由李作栋委员兼,宣传处处长由张济美委员兼,监察处处长由张荣授委员兼。余者如袁金章、王含章等委员。这些委员都是由主任委员马鸿逵任命的。

秘书处设有机要室、人事室;组训处设有组训科、党团科;宣传处设有编审科、宣传科;监察处也设有两个科。各科室由科长、主任负责,下设干事、助理干事。

1944年下半年至1946年以后。举行省选,选举代表是由银川市及各县委在省代表大会上进行无记名投票圈选。

省代表大会的候选人,原省党部委员是当然的候选人,也是代表大会上的当然代表。另外还有若干候选人,是由省党部提出的。

在选举前,有3名委员是由外地来的,一个是由甘肃省党部调来的,两个是由重庆中央党部派来的。省选选出的委员组成两个组织,一是执行委员会,一是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即马鸿逵,其余为委员有周百程、军法处长程福刚委员(书记长)仍兼秘书处处长,马济林委员(中央派)兼组训处处长,王仙槎委员(中央派)兼宣传处处长。

经过选举,取消“监察处”,并由委员组成监察委员会,由委员推选张仲璋(第十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任常务委员。

银川市党部的组织及活动

组织。1943年上半年,我担任宁夏省党部组训处干事,

宁夏越剧简介

刘阳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上海市的一支以华艺越剧团为主,并辅以光影、红花等团的部分演、职员组成的70多人的文艺队伍,在主要演员王素琴、陈月芳的带领下,于1958年9月下旬来到宁夏银川,支援宁夏的文化建设。

他们久居上海,乍到宁夏不太适应这里的生活习惯。越剧团的演、职员们便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锻炼自己,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劳动,尤其在自治区刚刚成立时的困苦条件下,对这批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上下的上海人来说,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尽管剧团中大部分是女同志,但她们以泼辣、顽强的作风投入到每一项工作中。他们自己脱土坯盖住房,拉砖运土修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和兄弟团体一起冒着严寒,忍着饥饿,在贺兰山下开荒、修渠、积肥、种田。

扎根宁夏,为宁夏回汉人民服务。对越剧团这些南方人来说,必须闯过语言关。语言不通,就无法了解这里的人民。为消除语言障碍,越剧团的演、职员们主动与当地群众接近,向他们学习,与他们交朋友,尤其在深入到广大农村社队时更是如此。他们几乎走遍了全区各个县市。每到一地,除演戏外,还要给老乡理发、洗衣服、挑水,与回汉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让宁夏人民看懂越剧,剧团的同志利用幻灯字幕,用普通话介绍剧情,进行讲解。经过不断的努力,越剧这个南方剧种已逐渐为宁夏观众所喜爱。为使越剧能在“塞上江南”扎根、发芽、开花、结果,越剧团的演职员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从到宁夏建团开始,便排出了不少丰富多彩的剧目,如传统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其中《叶香盗印》一剧曾在自治区首届文艺观摩汇演大会上被评为优秀剧目。为了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她们还在运用传统程式,突破旧程式,表现新的生活内容方

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排演了一大批现代剧目。如《李双双》等,并把这些优秀剧目送到了农村、工矿、部队、学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他们就步行几十里,背着服装、道具、乐器送戏上门。没有剧场,就在露天演出。没有电灯,就点上汽灯。在基层演出时,为了满足观众要求,他们经常是一天两场戏或一天三场戏。一次在西吉县农村的演出,由于观众强烈要求,竟在一个露天剧场上前后台同时演出两台戏,两边的观众人山人海。这些偏僻的山区从未来过剧团,老乡们看过戏后拉着剧团同志的手激动地说:“若不是党和毛主席的好领导,我们哪能看上这样好的戏啊!”

宁夏越剧团不仅全心全意为本区广大回汉族人民服务,还多次赴兄弟省市演出。他们于1962年、1963年两次赴苏州、上海、杭州等地演出,获得好评,为自治区赢得了荣誉。由于越剧团全体同志在工作中不断取得优异成绩,自治区曾授予“集体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粉碎“四人帮”后,她们相继排演了大型剧目《胭脂》等。其中《康熙访宁夏》曾获自治区1980年剧本一等奖,并被摄制成电视片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霓裳恨歌》:在1982年全区专业艺术团体自创剧目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得高度评价,在越剧创新、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980年和1981年,宁夏越剧团又两次带着《钗头凤》等剧目到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1980年在杭州演出时,正值酷暑,剧场内正在修理,没有冷气设备,而观众为了欣赏自治区越剧团的精彩表演,竟在深夜两三点钟开始排队买票。

近年来,一批越剧新秀又涌现在舞台上。这个团在女演男角色的基础上逐渐实行男女合作,力求在戏曲改革方面不断向前迈进。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十九辑)